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一辑）

The Psychology of 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民族心理与国际主义

〔美〕匹斯伯利 (W.B.Pillsbury) 著 陈德荣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一辑）

The Psychology of Nationality and Interationalism

民族心理与国际主义

〔美〕匹斯伯利（W.B.Pillsbury）著 陈德荣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心理与国际主义/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心理学)

ISBN 978-7-5520-1832-5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民族心理学—研究②国际主义—研究 IV. ①C955②D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43号

民族心理与国际主义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32-5/C.127

定价: 98.00 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模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匹斯伯利 (W.B.Pillsbury) 著 陳德榮 譯

民族心理與國際主義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譯者序言

本書著者匹斯伯利教授 (Professor W. B. Pillsbury) 是美國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他很早就已經在密執安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任教及主持該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室了。他的著作很豐富，差不多每幾年都必有一種重要的著作出版。因為他根本是一個心理學家，所以他之已經出版之諸種著作，也都是屬於純心理學的範圍之內的。但是他之這一部著作，卻是論及社會問題——民族——的。他之所以有侵入社會問題之興趣，他已經在於他的序文中說過，是因為他偶而遇到了幾個美籍希臘人回到希臘去參加巴爾幹戰爭。因為遇到了這幾個人，他便在於心中有所感觸，種種問題便浮現在於他的心中，於是到了上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便着手寫成這本書了。

著者在普通心理學上的主張，可以說是屬於機能主義派的；這可以由於他所著之那幾種屬於純心理學範圍之內的著作之內容而見之。但是雖然如此，他在於下心理學定義之時，卻又把心理學定為行為的科學。這便很可以看出，他在根本上乃是持着一種調和徘徊的態度了。那麼關於他之這本書之根本主張，他也在他自己的序中說過，乃是把麥獨孤的本能論，和託洛忒的習俗論，調和起來的。因為他是持着這種之調和態度的原故，所

以在他說明各種民族現象之時，我們便處處都可以看見，他乃是既以本能情緒之類的原素，做為各種現象所以成立之基礎，而同時，又認為理想標準之類的東西，也生有很大之影響的。

本書最重要的見解，我以為是在於著者把民族這種東西，認為是心理上的一種單位。平常研究民族問題的人，常把語言血統等事，認為是測量民族之標準。這就是說，一個民族之為一個民族，牠的各個分子，應該是說着一種共同的語言的，而且應該是由於一些共同的祖先繁衍下來的。但著者則以為這類標準，並不是十分可靠的。因為語言這種東西，是生有變動的，假使我們依照現時的語言而判斷，則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兩州之人民，應該是德國人而不是法國人了；而且我們中國，現在語言非常之分歧，也應該是許多個民族而不是一個民族了。至於血統，則在事實上，各種的人種，到了現在，可以說都是已經發生過很複雜的混合了的。例如英國人，乃是由於克勒特人（Celts）及條頓人（Teutons）混合起來的；法國人乃是由於古西班牙人，克勒特人，及條頓人混合的。而我們中國人，在北部的，大概混合了匈奴，鮮卑之類的人種，在南部的，則混合了太人及他種蠻夷。所以血統之事，也是不可根據的。依照著者看來，民族這種東西之根本要素，乃是民族性，而民族性之標準，則在於本民族中之各個分子，覺得自己民族中之別的分子之動作與欲望，乃是對的，而別民族之理想，則是錯的。而要判斷一個人到底是屬於那一個民族，則在去問他而去求得他的回答。他的回答不一定是誠實的，不過他的回答誠實與否，可以由於他的行為而判斷之。

這種見解，不但是對的，而且對於我們目前的中國，是很有實用性的。因為照這種見解說來，民族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用人力以造成的。這就是說，「覺得自己民族中之別的分分子之動作與欲望乃是對的，而別民族的理想則是錯的」這一點，乃是思想上的習慣，是可以培養而成的。中山先生提出國族之說，本是勸勉我們創造民族之意，而今著者有這種見解，又表示民族是可以由人力造成的，是很可以做為中山先生之說之補助。我們中國，在目前這個時候，的確在形式上雖然已經成為一個國家，而在實際上卻又是還不會成為一個民族的。近年來國家處在於危難的狀況之中，漢奸卻到處都是，很足以證明這點。因之，在於創造民族之上，我們還須做一般努力纔成。在本書中，關於如何去創造民族這點，雖然並不會有其系統之指示，卻是讀者讀畢這本書之後，我想總應該得到許多之暗示。

原序

在巴爾幹戰爭 (Balkan War) 的時候，曾有一些美國希臘人 (American Greeks)，從美國回到希臘去參加戰爭；那麼我之所以生有著這本書之意，就是因為在於那個時候，曾遇到一些這類的希臘人。因為遇到這些希臘人，於是在於我的心中，便生出許多問題來了。這些問題發生之後，我會努力去回答過，而且我所做的回答之中，有一部分也還算自己滿意。至於理論方面，則華勒斯 (Graham Wallas) 及他的學派所有的諸種著作，其暗示於我的地方要算很多了。

現在，我這本書算是已經完成了。我在這本書中所持的主張，似乎就是把麥獨孤 (Mc. Dougall) 的主張，和託洛忒 (Trotter) 的主張，拿來調和一下。麥獨孤認為，人類的社會反動之根本原因，乃在於直接的本能。託洛忒則主張，一切種社會的現象，都可以用着個人對於社會整體所生的恐怖心而說明之；而因為個人對於社會整體，生有恐怖之心之故，於是社會的習尚，便變成爲影響於人類行爲的重要因素了。而我在於本書之中，則證明各種的社會反動，其所以能够成立，直接的本能及社會的習尚，兩者都各有其力量。在我看來，各種的社會反動，在開始發生出來的時候，非常之生硬不熟，直是各種的本能而已，但到後來，他們便受着各種的習俗及各種的理想（這

類習俗與理想，是由於經驗而發展出來，且是因為人們具有「羣的本能」之故，便成為團體所具有的東西的。）所決定了。再，我們似乎還必定要堅決地確信着：由於本能及習俗與理想之類的因素發生作用所生的結果，並不是沒有價值的。由於讀託洛忒的書，我們至少可以得這樣的印象：人在於羣衆之中所發生的動作，乃是很可悲的；而且他所進行的那類習俗，其所會生出來的結果，也會是不稱意的。但是在一個人有這種的意見的時候，他常常會忘記了下面這兩點。這兩點就是：理性這種東西之自身，並不是別的東西，牠只是用着豐富的經驗及因襲的習慣，來控制着人們的動作與思想之一種控制作用而已；再，各種的習俗，有的時候，雖然是促進着極端的保守事情的，然而同時，牠們也防止那類只根據於衝動而並不經過思想的動作，且防止那類由於不加控制的觀念聯合而成的思想。例如在於倫理學中及心理學中，人們常常都有一種普通的趨向，這就是，在於一種歷程已經分析過後，人們常常忘記了這種歷程，也就是他們在開始做分析的時候所用到的那種歷程。

我想謝謝我的同事道烏教授 (Professor Reeves Dow)，因為本書後面幾章之中有幾章，他曾為我閱讀過，且曾提過一些意見於我。不過在那幾章中所主張的教義，或在那幾章中所有之為我所看不出來的錯誤，他卻是不能負責任的。此外我還想鳴謝我的妻，因為她會校對我的稿。

目錄

第一章	民族性問題·····	一
第二章	民族爲一種心理的單位——各種社會的本能·····	二〇
第三章	憤恨是一種社會力·····	五八
第四章	歷史上的民族性·····	八三
第五章	在歸化歷程中之民族性·····	一一六
第六章	民族與羣衆意識·····	一五一
第七章	民族心靈·····	一七一
第八章	論民族之爲理想·····	二〇七
第九章	民族性與國家·····	二三三
第十章	民族性與超民族性·····	二六三